

传教士在近代浙江的教育活动述略

谷雪梅

(宁波大学 文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近代以来, 基督教传教士进入浙江拓展教务, 为了增强传教效果, 他们创办了各类教会学校。西方传教士在浙江所进行的教育活动虽然带有殖民扩张和宗教传播的强行渗透性质, 但同时也引入西方先进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 客观上推动了近代浙江教育事业的进化。

关键词: 传教士; 浙江; 教育活动

中图分类号: G40-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2009)02-0037-05

鸦片战争后, 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进入浙江传教。在传教过程中, 他们把创办学校作为在浙江传教的重要辅助手段,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浙江的教育变革。本文对基督教传教士在浙江的教育活动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 探讨基督教传教士对近代浙江教育所发挥的作用。

一、近代基督教在浙江的传播

1842年,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 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传教权, 纷至沓来, 浙江成为全国基督教传入最早的省份之一。1842年, 美国传教士米怜(Milne)在定海建立了教会。1843年, 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MacGowan)开始在宁波行医传教。1844年美国长老会义塾麦嘉缔得宁波英国领事馆的帮助, 领事馆附近租房, 施医传教。1848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禄赐、戈柏来宁波传教。1850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匙良来宁波, 第二年, 美国长老会建成槐树礼拜堂和府前礼拜堂。1854年英国福汉会传教士戴德生来宁波传教, 第二年, 在宁波另树一帜, 创立中国内地会, 著《中国的精神需要和要求》, 呼吁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1]

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 水路交通方便, 各国传教士以宁波为基地, 逐渐深入浙江各地, 在绍兴、杭州、湖州、台州、温州、衢州等地传教, 建立教会组织。1847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苏美格偕华籍牧师谢百英, 经宁波至上虞开展传教活动, 这是基督教进入绍兴的开始。1858年, 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霍约瑟来绍兴传道。1863年, 美国传教士在上虞曹娥建立基督教分堂。^[2] 1858年,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中国传教士张澄斋从宁波来杭州布道。1859年, 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尔腾来杭州传教。1866年, 美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秦镜来杭, 在银洞桥租屋开始布道。同年, 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戴德生来到杭州, 设堂传教。^[3] 同治年间, 内地会传教士卫斯美来到湖州传教。1877年又派遣兰卿牧师到安吉设分堂传教。1887年, 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梅思恩也来到湖州立堂传教, 而后又织里、和孚、菱湖等地设堂。^[4] 同治初年, 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进入临海县传教, 在溪南村首建教堂。1868年, 内地会传教士赖恩在海门镇建立教堂。1871年, 内地会传教士戴德生、卫养生和中国牧师范继生自奉化经宁海入天台传教。1873年, 在城关妙山购房, 立堂传教。1866年, 内地会英国传教士曹雅直自宁波来温州传教, 1877年建堂, 此为新教传入温州的最早教派。1877年, 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李华庆来温州传教, 在城西街建立教堂。1882年苏慧廉来温州继续传教。^[5] 1872年, 基督教由美国传教士司徒牧师传入衢州。1882年内地会德籍女传教士到常山租屋传教。^[6] 到19世纪末, 基

收稿日期: 2008-10-10

基金项目: 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课题(07JDHY004YB);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07N48)。

作者简介: 谷雪梅(1973-), 女, 黑龙江尚志人, 宁波大学文学院讲师, 博士。

督教教会已经遍及浙江各地,浙江各地教会组织已经初具规模(见表1)。^[7]

表1 1893年浙江基督教会分布

地区	教堂数目	外籍传教士人数	备注
杭州府	9	9	附设医院2、义塾2、购书堂1
嘉兴府	4		共有教徒约210人
湖州府	4	3(2位杭州教士兼)	
宁波府	30	至少20	附设监督会1、书院1、女书院1、义学1、医院2
绍兴府	27	7(其中有2位杭州、宁波教士兼)	附设讲堂2所
台州府	15	2	附设医院1所
金华府	10	7	
衢州府	4	8	附设戒烟局1所
温州府	6	6	附戒烟所1、收养盲瞽人院1
处州府	5	3(其中1位教士温州教士兼)	
共计	114	至少57	

二、基督教传教士近代以来在浙江的办学情况

西方传教士在浙江大力推进宣教事业的同时,将教育作为重要的宣教辅助手段,还创立了一定规模的教会教育事业,主办了各类教会学校,其中有些学校在浙江甚至是全国具有开创之功。至1923年,基督教传教士在浙江75个县中的42个县办有教会学校219所,其中包括幼稚园3所、完全小学63所、初级小学125所、中等学校23所、专门学校5所。^{[8](238)}这些学校大多集中在杭嘉湖及宁绍一带,边远山区如江山、常山、龙泉、云河等县也办起教会学校。下面就四个方面对此进行考察。

(一) 女子教育

基督教传教士在浙江办学之初就十分重视女子教育,在宁波创办了浙江也是中国大陆最早的女学。公元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传教士奥特绥(Mary Ann Aldersey)来宁波传教,创办了女子学校,开设有国文、算术、圣经等学科,开创了近代浙江女子学校教育的历史。1846年(道光二十七年)美国长老会差会的传教士在宁波城内设立一所女校,1857年(咸丰七年)同爱尔德赛所办女校合并,称崇德女校。1860年(咸丰十年)美国浸礼会女传教士罗尔梯(Lold EC)在宁波城北江滨创办浸会女校,后改名圣模女校。

1867年(同治六年),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在杭州皮市巷创办贞才女塾。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美国基督教会北长老会在杭州大塔儿巷创办的育才女学堂;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美国基督教会北浸礼会传教士创办惠兰女学堂;1910年(宣统二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冯·玛利亚创办的冯氏女子学堂等。在温州,1875年,英国内地会开办了一所女学校;1878年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在永嘉创办学塾,后改称为艺文学堂。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将办在江苏省嘉定县的文洁女校迁来浙江省湖州继续办学,改称湖郡女子中学。到1917年(民国六年),浙江全省128所各类教会学校中,女子学校有15所。^{[8](238)}

教会女学创办之初,大多程度较低,大多为小学阶段,招生工作也十分困难。1844年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以后,谣言四起,有人说她是魔鬼的化身,已杀死她自己的孩子,现在又来算计别人的孩子;有人说她办学是假,骗儿童去挖眼睛炼药水是真。为了吸引学生入学,爱尔德赛女士采取了免收学费、发给衣物等措施,收效较为明显。“时风气未开,甬人颇疑虑,裹足莫前,女士不以此灰心,卒的学生数人,豁免其学费,供给其饮食,且津贴其家属,以是渐得社会信任,翌年,乃有学生十五人,后增至数十人。”^{[9](1122)}随着教会女学的发展,其示范效应也逐渐发挥影响,招生状况也逐渐有了改观。教会女学中培养了一批接受新知识的新女性。1870年浙江宁波一位叫金雅妹的6岁孤儿,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往日本求学。1881年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习医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

(二) 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

基督教传教士在浙江建立了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较为完备的教育体制。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医生麦嘉缔(McCartee D B)在宁波江北岸槐树路设立了一所男生寄宿学校,名为崇信义塾,系外国教会在浙江所办最早的一所寄宿制男子学校。此后,美国浸礼会、监理会、英国圣公会等陆续在宁波开设学校。《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教会学校也开始由宁波向浙江各地扩展。1876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于府城观音桥建书堂。光绪二十四年,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在金华县创办作新小学堂。光绪二十六年,美国基督教北浸礼教传教士甘惠德在杭州创办惠兰小学堂。光绪二十八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杭州创办私立信一小学堂。光绪二十九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在绍兴南门承天桥创办英华初等小学堂。光绪三十年,瑞士女传教士福尔东在丽水县城创办私立崇德小学堂。光绪三十四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奔龙在龙泉县城创办私立养真初等小学堂。

传教士在浙江开办的教会学校,最初多是初等小学,后来通过扩充、合并,向中等及高等程度发展。由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创办的之江大学前身便是崇信义塾与育英书院。1845年开办在宁波的崇信义塾,相当于小学程度。1867年迁入杭州,1880年发展为中学,1897年改称育英书院,分正、预两科。1902年,预科改为附属中学堂。1908年,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要求同北长老会合办育英书院。1911年迁入新校址上课,改名为“之江学堂”。1914年,之江学堂改名为之江大学。1920年,设有天文、生物、化学、数学、国文、英文、现代欧洲语、教育、地理、历史等15个系。^[10]该学校注重英文教学,教科书多采用英文原版。

此外,基督教会还创办医科院校,有广济医学堂、药学堂及广济产科学堂。1883年英国圣公会在广济医院开始筹设医校,由希金(Hickin S)医师专任教务,1885年招学生10人,至1905年先后招生四届。1906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梅藤更将杭州大方伯巷戒烟所改建为医校,称广济医学堂,同时,又成立广济药学堂,属专门学堂性质,由梅藤更自兼校长,这也是杭州开办西医专门学校的开始。到辛亥革命前夕,广济医学堂有7届毕业生共60人,每届学习四年。1904年,英国圣公会还设立了广济产科学堂,附设助产科,后又增设护士科,培养助产、护理人员,逐步形成护理队伍。

(三) 神学教育

为了克服来浙的传教士人员不足的困难,基督教会还创办了神学院校,以培养本地传教人员。1883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霍约瑟在宁波三一书院内附设三一神道院,学制3年,为浙江教区培养教牧人员,对基督教圣公会在浙江的传教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据1949年刊印的中华圣公会年鉴载:“全教区之各等圣工人员除二人外,均为之毕业生。”1905年,英国圣公会女教士慕华德创办了仁爱女子圣经学院,培养女传道。此外,美国基督教浸礼会还在杭州等地创办了圣经学校。

(四) 社会教育

基督教会在浙江还从事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教育。1917年,由长老会中西牧师在宁波发起成立了“基督教福音研究所”,举办英文商业学校、义务半日学校等社会教育。^{[9]([374])}1923年,由杭县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招收“已过学龄期而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识字平民”,在杭县城区有平民学校84处,入学平民达1668人,参加学习的有工匠、工役、小贩、无业者等等。

此外,基督教会还举办了具有慈善性质的学校。1911年创办于鄞县高桥的中华基督教恤孤院是办得比较成功的孤儿教育机构,由宁波中华圣公会、浸礼会、中华基督教会、圣道公会、基督徒会所合办。该院章程称:“本院专收无依孤儿,授以相当学术及工艺,以养成全有用之国民”,设有两级小学及印刷、地毯、缝纫等科。^[11]

三、西方传教士对近代浙江教育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涉及各个领域,但其“影响在教育方面最强”。^[12]基督教传教士在浙江创办教会学校,由于其产生、发展是以前外国资本主义对华侵略为背景的,因此,它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对华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传教士最初创办学校的目的,是希望拥有

一批固定的听众,扩大基督教在浙江的影响,广泛传播基督的福音。特别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基督教徒的逐渐增加,传教士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传教活动,希望进一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从而加大办学的层次和规模。但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传教士也将西方近代教育体制移植到浙江,打破了封建教育的垄断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浙江教育事业的转化。

清末浙江的封建教育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已明显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在浙江出现的第一批讲授中西学的学校,是由传教士为传教所创办的教会学校。西方传教士普遍认为科学和数学是训练学生推理能力所不能缺少的,由他们所办的教会学校除开设大量与基督教有关的课程外,还开设了许多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新式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地理、音乐和体育等。如杭州的育英书院附属中学堂的8门课程是:圣道、经训、国文、英文、历史、地理、历史、算学、博物,各年级每周授课24小时;办在杭州的惠兰中学堂所设6门课程是:国文、英文、算学、理科(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历史、道学(圣经))。^{[8](300)}由英国圣公会所办广济医学院,开设了生物学、动物学、化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胚胎学、组织学、治疗法、临床学等课程。

这些课程的开设,不仅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也培养了一些科学人才,为浙江近代教育的转化起到了某些示范作用。

在教育方法上,西方传教士也模范英美各校的教学方法,改变中国传统的熟记课文、解释字义等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强调由教师进行演示实验或由学生自己操作进行科学实验的方法,并在教学中应用先进的教学仪器。之江大学从美国陆续引进X光机、发电机、显微镜等先进的教学仪器,应用于教学中。此外,还注重课堂学习与课外实践的有机结合,广济医学堂医学课程的学习同医疗实践活动就有很好的结合,促进了学生在各方面素质的提高。

在教育观念方面,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打破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将一些先进教育观念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浙江教育观念的革新。他们主张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穷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传教士也开创了浙江第一批女子学校。在晚清之前,中国妇女一直受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关系的压迫,儒家的“三从四德”及由此派生出的种种社会恶习,使广大妇女只能扮演男性附属物的角色,在社会各个领域均处于受支配地位,当时女子读书也受限制。传教士兴办女学的活动,给了女子受教育的机会,直接冲击了旧的封建道德习俗和旧的教育制度,培养了一批接受西式系统教育的女学生,推动了近代浙江女子教育。

综上所述,西方来浙传教士兴办教育的目的是用基督教和科学培养、控制中国的知识阶层,为殖民扩张和掠夺服务,但西方传教士兴办教育的同时也将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带到了浙江,并深深影响了浙江的近代教育。

参考文献

- [1] 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宁波市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2796.
- [2] 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绍兴市志[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2953.
- [3] 任振泰. 杭州市志: 第六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449.
- [4] 湖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州市志[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1999: 382.
- [5] 温州市志编纂委员会. 温州市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471.
- [6] 衢州市志编纂委员会. 衢州市志[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227.
- [7] 张彬. 浙江教育史[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6: 332.
- [8] 浙江教育简志编纂组. 浙江省教育简志[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 [9] 张传保. 鄞县通志: 政教志5[M].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6.
- [10] 杭州教育委员会. 杭州教育志(1028-1949)[M]. 杭州: 杭州教育出版社, 1994: 524.
- [11] 孙善根. 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1912-1936)[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106.
- [12] JOHN K Fairbank.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3.

(下转第83页)